

遼寧文史資料

第九輯



K250.6

38

2:9

辽宁文史资料

第九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沈阳

B 137788

辽宁文史资料

Liaoning Wenshi Ziliao

第九辑

辽宁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沈阳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字数: 108,000 开本: 850×1168 $\frac{1}{4}$ 印张: 4 $\frac{3}{4}$
印数: 1—5,500

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王鸿宾

责任校对: 陈文本

封面设计: 赵多良

统一书号: 11090·137

定价: 0.62元

编辑 凡 例

- 一、本选辑的编刊，是为了积累、保存、核整所征集到的史料，供历史研究的参考，并用以推动史料的征集工作。
- 二、本选辑所刊载的史料，多是撰写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内容可能不尽翔实，观点也可能不完全正确，因此，只在内部作为不定期刊物发行。
- 三、本选辑所刊资料，欢迎阅者提出补充和订正意见。
- 四、本选辑对来稿，可加以综合、删节、选录和作文字修改。

目 录

怒洒一腔血，保卫我中华……………宋 黎（ 1 ）	
——组织东北抗日义勇军经过	
重庆软禁琐记……………高崇民（ 8 ）	
忆高崇民同志和叛徒袁晓轩的斗争……………梁蔼然（ 21 ）	
“一二·九”运动在天津北洋大学……………马龙翔（ 26 ）	
闯关找党……………邱新野（ 31 ）	
东北抗日救国军第五十六路抗日记实…张醒 汪世和（ 43 ）	
回忆王彤轩、梁希夫与辽东义勇军……………张连久（ 60 ）	
我所知道的邓铁梅……………潘天相口述 潘北平整理（ 67 ）	
忆邓铁梅二三事……………孙修吾（ 71 ）	
甲午战争中日寇在旅顺大屠杀调查记实……………曲传林（ 74 ）	
柵原农场……………佟尔佳（ 79 ）	
原国民党军统局东北区“对日工作”的阴谋活动	
……………张 瑞（ 83 ）	
原国民党军统局东北区“对韩工作”的阴谋活动	
……………张 瑞（ 96 ）	
“东北青年学社”的前前后后……………郑作藩（ 101 ）	
前热河地方烟毒史话……………杨桂芳（ 111 ）	
会局种种……………李祖慈（ 116 ）	
瑞应寺简史……………勿日套陶遗作 韩景林整理（ 120 ）	
对《1921—1933年东北空军的历史回忆》的补充与	
勘误……………翟梅林（ 144 ）	

怒洒一腔血，保卫我中华

——组织东北抗日义勇军经过

宋 黎

一九三二年初，我同车向忱和一位姓李的同学到东北进行抗日宣传活动，联络抗日义勇军，开展武装斗争。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临行前，我们分析了东北的形势，研究了路线，活动方式及需要注意的各项问题。车向忱化装成中药先生，身穿长袍马褂，留着八字胡，我和姓李的同学分别扮成他的徒弟。车向忱身背褡裢，褡裢里装着许多中草药，药里藏着张学良用黄绫子写给马占山和邢占清的委任状。我们从塘沽坐日本轮船“天潮丸”到达大连。下船后，安全地通过了日本水上警察署的检查，没有发生问题。为了争取时间，我们没有在大连停留，先后到皮口、庄河、安东、宽甸、桓仁、通化、西丰、四平、辽源、洮南、昂昂溪、齐齐哈尔等地，向广大东北农民、知识分子及东北军旧部展开宣传。宣传的主要内容是：蒋介石卖国，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抗日，使东北人民遭受日寇蹂躏，只有我们自己武装起来，不怕流血牺牲，对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才能驱逐日寇，恢复我东北大好河山。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走遍了大半个东北。当时正是隆冬季节，莽莽森林，一望无垠，雪野霜天，满山皆白。我们有时走，有时爬，有时坐上一段大车，到城镇和农村中去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

经过组织与发动，在辽源有二十几个积极主张抗日的青年，很快地把当地一些爱国青年组织起来，成立一支抗日队伍，并且攻打四平。在西丰时，有一位姓冯的县长，是车向忱的老朋友，奉天两级师范的毕业生，有爱国主义思想，早年曾从事反日活动，我们针对这一情况，向他讲述蒋介石不抗日，不要依赖蒋介石政府，要自己组织力量进行抗日。我们谈得很好，最后决定他利用县长的地位，组织保安队。队伍组织起来以后，他们制造了许多土枪、土炮，不断地打击着日本侵略者。

为了争取邢占清旅抗日，我们又到哈尔滨以东苇河一带去作宣传动员工作，向该旅官兵讲解抗日道理，这支队伍终于在邢占清领导下走上了抗日的道路。

一九三二年春天，我们在哈尔滨研究决定：车向忱留在北满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小李到通化地区搞抗日活动，我到沈阳及南满一带去组织抗日义勇军。在我到沈阳之前，张金辉等已经与张学良创办的学兵队成员戴昊、那拯彬及原东北讲武堂的范甫忱等组织了一支抗日义勇军，这支队伍曾袭击了沈阳飞机场。我记得有一个叫小燕子的队长，人很机智，他率领一支精悍的队伍钻进了敌人飞机场，击毁和焚烧了好几架敌机。

在清源、铁岭、法库、开原、新民等地区，我们都广泛发动群众，组织抗日义勇军。当时我同张金辉、范甫忱、戴昊、江涛等是主要负责人。范甫忱、吴海山、张金辉率领抗日义勇军与日寇在秀水河子打过遭遇战，缴获不少枪枝弹药。一九三二年秋，范甫忱同志从农村到沈阳，不幸被伪警察署逮捕，英勇就义了。

一九三二年五月间，我同戴昊、江涛、那拯彬到辽西一带继续开展武装抗日活动。经过许多艰苦工作，我们逐步把分散在辽西地区的抗日力量组织起来，成立了“东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队伍发展到一千人。总指挥是我，参谋长是江涛，

军事负责人有戴昊、那拯彬。为了安全，我们的指挥部设立在新民县东长沟沿地方保安队骑兵分队李队长办公的地方。这个分队长原是地方开明士绅，同情抗日，有正义感。为了争取他积极抗日，我首先通过一位姓李的回民老乡向他做工作，以后我通过老李认识了他。第一次同他见面时，是在他的办公室里。那一天，日寇不断打炮，炮弹从房顶嗖嗖而过，他却泰然自若。我向他讲解了一些抗日道理。在我讲话时，他插言问我：“少帅怎么样？”我对他说：“少帅想抗日，可是蒋介石不干。”他沉思了一会儿，果断地说：“应该干！我一定抗日。”于是我们便委托他做营长。此后，他不仅积极抗日而且英勇善战，经常向我们报告日寇的行踪。日寇进攻时，在我们统一指挥下，一起同日寇作战，日寇走了，就由他出头维持地方社会秩序。不仅如此，他还把附近的地方保安队一个姓吴的小队长介绍给我们，为我们通风报信，在战斗中起了不少作用。记得有一次这个吴队长接到伪军通知，让他们配合日寇在长沟沿一带围剿，追击抗日义勇军，他立即告诉我们，我们当即转移，使敌人扑了空。

为教训日本帝国主义，指挥部决定于一九三二年十月攻打新民。决定以后，我只身进入新民县城内了解敌情。通过可靠关系介绍，我到清真寺了解情况，有时隐蔽在阿訇那里，有时住在抗日群众家里。敌人在新民县城四周拉了电网。为避免与减少我军伤亡，我通过一个姓李的教师同新民县电业公司联系，确定到时不送电。为阻止敌寇增援，准备在打响后，用火车头将通往巨流河的大桥堵死，同时对各路进攻路线都做了周密部署，把力量较强的第四民团调来专门对付日寇铁甲车。攻打新民由我任总指挥，当时我方二十一岁，缺乏战斗经验。在进攻前，我们考虑到新民离沈阳很近，打响以后，敌人会很

快增援，我们决定不进行占领，进攻目的主要是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对敌人进行破坏，以壮大抗日力量。目的达到后，我们就分路撤退了。

原东北军步兵第二旅参谋李士廉由于该旅对日寇不抵抗，便参加了义勇军。一九三二年初，他同方文阁组织一支抗日队伍，在沈阳、辽中、黑山一带与日寇作战。以后，他又同张金辉接上关系。一九三三年三月，我们在沈阳大西门一家小客栈里见了面。当时冯玉祥、吉鸿昌正在热河、察哈尔一带组织抗日同盟军。我们了解到驻守在吉林太平川的伪安国军步兵第二旅要开往热河，我们准备争取这支队伍成为抗日队伍，与冯玉祥、吉鸿昌联合抗日。我们了解到该旅副官长肖钟英是张金辉的老朋友，年纪较轻，有正义感，主张抗日。参谋处长和肖钟英、李士廉是讲武堂同学，旅长苏正格与肖钟英还有亲戚关系。我们便派李士廉去见苏正格，经过该旅考试，李士廉被委任少校参谋。该旅到开鲁后，继续开往热河。但是，在争取过程中，由于特务告密，苏正格突然逮捕了肖钟英，并将其杀害了。于是我们便马上停止了对这一伪军的策反工作。

此外，我们对沈阳伪靖安军也进行过策反。经过我们的工作，有些伪军对日寇的暴行和“满洲国”的法西斯统治日益不满，有的主动给我们义勇军通报消息，有的参加了我们抗日队伍。

我们除利用一切机会打击日寇与瓦解伪军外，还布置队伍发动人民群众破坏敌人铁路交通。当时日寇在铁路沿线曾派驻大批军队，几乎天天在打炮。住在巨流河铁路旁的铁路工人孙队长，为了打击敌人，组织了二十几个铁路工人专门破坏铁路。我们就以铁路工人为主体的，组成了一支铁路爆破队，由我们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直接指挥。在破坏敌人交通方面，大家想出很多办法。工人和老乡一起，把大车轮子卸下来，用钢瓦

接头处的豁口撬铁轨铆钉，效果很好。戴昊、那拯彬、金硬同志还发动我们义勇军干部和战士们想办法，动员群众在夜深人静时，把敌人未炸响的炮弹悄悄运到路轨上面，把一颗或几颗炮弹放在一起，用火烧，使炮弹爆炸，破坏铁路桥梁，经常使敌军用火车停运。

为配合武装斗争，促进抗日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我们还进一步开展了群众运动。我们确定的斗争原则是：青纱帐起，就进行军事活动；青纱帐倒，就进城搞群众运动。在群众运动方面，我们重点搞青年运动。我们经常组织和带领青年在夜里贴标语，撒传单，印刷一些抗日宣传材料，寄到或运到伪机关、学校和医院的收发室，或投进日、英、美帝国主义领事馆门前的信箱里，以打击敌人，鼓舞人民斗志。

一九三二年冬天，我回到北平，见到“东大”的同学郑洪轩同志，经他介绍，参加了我们党领导的“反帝大同盟”。接着，我又到西山卧佛寺去看张希尧，当时他正和阎宝航、宁匡烈等举办“西山训练班”，我在那里除学习马列主义外，还学习了一些游击战术和爆破技术。

一九三三年初，我又从北平来到东北。到东北后，我同张金辉、郭明德、江涛、李士廉一起组织了“中华抗日铁血团”，经过推选，开始由张金辉负责，以后由我负责。“中华抗日铁血团”主要活动内容是：同各校师生和青年群众进行联系，争取团结广大青年和知识分子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吸取其中积极骨干参加“铁血团”。争取伪军，扩大武装斗争力量，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互相配合。开始时，只在沈阳活动，以后逐渐发展到开原、西丰等地，因此开原、西丰等地均有武装抗日活动。

在我们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同时，车向忱在哈尔滨开设了一所大同疗养院，并以副院长的身份进行抗日活动。大同疗养

院院长姓关，原是一个地方法官，积极主张抗日。我在哈尔滨的时候，经过他介绍，认识了开药房的吕大夫，这位吕大夫曾经领导过济南抗日运动。“济南惨案”发生后，敌人贴布告通缉他，他改名换姓，到东北继续搞抗日活动。他与我们取得联系后，曾同我们一起去苇河进行工作。我们还从南满抽出张子刚、王牺忱等青年学生到哈尔滨大同疗养院帮助搞抗日活动。车向忱还开设了一个鞋铺，做为联络点。

此外，我还同车向忱、张希尧等组织了“国民常识促进会”，宣传武装抗日，进行爱国主义与民族教育，提倡国货。在沈阳中街广生行隔壁，由车向忱开设了大众国货商店，并到小河沿销售国货。为了让群众认清日寇开设大烟馆毒害中国人民的罪恶行径，我同张金辉两人亲手制作了一些炸药，放进暖水瓶壳内，里面绑上引线，点燃香火，扮成烟客，把暖水瓶放进大烟馆内，炸毁了大西门外的一家日寇开设的大烟馆。“国民常识促进会”还通过有关团体，焚烧了一些鸦片。

我们到安东等地去开展地方活动，大部分是与教育界联系，因为车向忱在东北教育界的熟人很多，条件比较方便。譬如，我们到洮南就是首先与教育界的熟人联系，再通过教育界同该县县长取得联系，加上这位县长的妻子又是教育界的，因此经过几方面的工作以后，这位县长就积极参加了抗日活动。

为了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中华民族不甘心受奴役，经我们周密研究，决定炸帝国主义驻“满洲国”的使馆。由于炸药缺乏，我们主要炸日本使馆，对其他帝国主义领事馆，也通过我们联系的抗日爱国群众，设法放进了一些炸药，虽然炸药少，威力不大，但炸毁了帝国主义使馆的一部分房屋，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

一九三四年初，敌人开始了大搜捕，情况十分紧急，郭明

德与江涛相继被捕，伪《盛京时报》大肆宣传破获了“反满抗日案”。我知道这一紧急情况后，马上去哈尔滨告诉车向忱，并积极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郭明德同志被捕后，在日本宪兵队受到日寇严刑拷打，敌人将郭明德的双手吊起，用皮鞭蘸水抽打，他死去过几次，始终没有讲一句话。敌人给他灌辣椒水，坐电椅，甚至用电流通脑子，他坚贞不屈，明白过来时，就大骂日寇，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我的好战友，一位铁骨铮铮的抗日战士，五天之内，就英勇牺牲在万恶的帝国主义刑具之下了！江涛在日本宪兵队受到刑具折磨后，因为没有查到反日“罪证”，被转到伪奉天法院涉外庭，押在监狱里，我扮成他的内弟，同他妻子拿着换洗的衣服去探监，江涛两眼深陷，脸色蜡黄，但精神很好，他趁着看守不注意时，把事先写好的一个小纸卷塞给我，我回来一看，在一张香烟盒纸上写着：“我虽然被捕受刑，但能忍受住，你们不要挂念，要全心抗日，要以骆驼走在沙漠里那样坚韧不拔的毅力抗日到底。”这些激励之词，多年来，言犹在耳。

自一九三一年底，三年当中，东北抗日义勇军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沉重的打击。由于工作需要，我安排好牺牲与被捕的战友家属，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回到北平。以后，我又在北平进行地下党的斗争。一九三三年秋到一九三四年春，满洲省委建立与发展了东北抗日联军，到一九三七年，已发展到四万余人，原东北义勇军许多战友都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在满洲省委和东北抗联领导下，继续转战白山黑水，为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胜利，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做出了英勇牺牲与巨大贡献。

重 庆 软 禁 琐 记

高 崇 民

一九四一年春，因同学好友杜重远先生在新疆被盛世才诬为与汉奸汪精卫有勾结，置于狱中。余电盛争辩，往复不已。最后盛邀余飞新面谈（盛与余是小同乡，系晚辈亲属，又在奉天同过学，余以开原县费留学日本时，曾接济过他初期留学日本的学费）。当时国内各地飞机全归特务头子戴笠掌握，非经批准不行。余函重庆“东总”王化一转请于戴，戴表示同意，但约余先到重庆一晤。余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初，由陕西凤翔动身到宝鸡乘公路汽车，乘客中有一女青年王桂珊，辽宁沈阳人，亦赴重庆。由此相识，不料后来竟成眷属。余抵渝后，戴托词不见者达二十日。余知新疆之行有了变化。及与戴见面时，戴以严冷态度，干脆告余新疆不能去。余乃力争，戴率然起立说，你若必欲去新疆，除非你想离开中央。余徐徐笑曰，何言之重也。戴颜色转为温和，不觉脱口说出，委员长比咱们明白，你若去新疆，盛世才能让你回来吗？杜重远就是因为由中央去的，才为盛所嫉。你今仍由中央去新，盛世才不同样把你当杜重远看待吗？言下是为余的安全计，实则当时正是希特勒进攻苏联，盛世才亲苏政策已在动摇，故囚杜杀弟（盛之胞弟名盛世骐，苏联红军大学毕业，掌新疆军事）与蒋勾结，以此表示真诚。蒋恐余赴新阻盛之内向，故不放行。余知不可争，乃打消新疆之行，表示要回西安。而戴竟以甘言劝余，不要回西安，说

你若回西安，他们（指戴的特务群）会找你麻烦的。余说我的病妻尚在凤翔。戴立即顾其仆从说，可派人把高太太接来。余又说，重庆敌机轰炸甚厉害，病人来此不便。戴说你可住在乡下。至此，余始悟，约我来重庆，原为软禁耳。”

余既被软禁于重庆，只有就地奋斗，一面作抗日宣传活动，一面反对蒋介石的独裁。这是民族民主双重任务，因以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总）为活动基地。此时之“东总”，只有阎宝航、陈先舟、王化一三人担名，因刘澜波、于炳然早已去陕北，于毅夫去香港转投新四军，徐寿轩去桂林开饭馆，阎、陈在重庆亦以搞商业为掩护。阎任吉林萧振瀛办的大明公司经理，陈初与孟用潜办太平公司，以后又与他的小同乡袁东衣（都是通化人）办一建业公司，接着与CC分子王德溥（东北人）搞一复东公司，均无成就。王化一则出入于戴笠之门，主要为了探听张学良的消息计。“东总”实际已无人负责，只好由余承担。而会内老干部徐仲航骄傲自负，目空一切，与青年同志秦笠、冯世康闹不团结，对东总决议，亦不执行。时“东总”设在市内领事巷，被敌机炸毁一半，决定迁到乡下猫儿石。徐当时是地下共产党员，坚决反对，拖延不搬。以后敌机又行轰炸，冯世康同志竟被炸死（余悼冯文，载入忠恕斋诗稿）。至此“东总”才迁到乡下。徐当时受今总理周恩来的批评，曾一度到猫儿石道歉，由此亦即与“东总”断绝关系，以后叛党。

“东总”自成立伊始，即为党的外围组织。当在北平建立时，南汉宸同志指定我和刘澜波、栗又文三人为核心，举栗为秘书长。这样一个组织，自然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于是东北籍CC分子齐世英，以陈立夫为靠山，在南京成立一“东北协会”，专门与“东总”对立。这是抗日与亲日的两条路线之争。但国民党内部分两派：（一）所谓中央统计局，以陈果

夫、陈立夫为首，简称中统，外人称为C C（英文陈的字头）；

（二）所谓军事委员会统计局，以戴笠为首，简称军统，亦称蓝衣社。两派争权夺利，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东总”一直利用两派之间的矛盾得以存在。原来东北籍C C分子齐世英、梅公任（原名佛光）、张哲先、高惜冰、王德溥、曹德宣等，都是在“九·一八”后反叛张学良的，而戴笠自“西安事变”后，表面照顾张学良，他想借过去蒋、张合组的四维学会的关系，拉拢张的干部以为己用，故对“东总”的人一面监视，一面表示伪善。C C则不然，千方百计地陷害“东总”。“东总”初由南京撤退到武汉，住武昌明月桥时，东北籍C C分子韩涛，一日到“东总”寻隙，被“东总”青年打骂后，韩即告到伪警所，纠缠甚久。当于炳然、于毅夫和王化一在武汉主持“东总”时，齐世英等伪造“东总”图章文件，诬告“东总”要举行暴动，蒋介石交戴笠查办，其势甚凶。后经银行家鉴定，证件图章系根据“东总”原有图章而加以伪造的，真相暴露，事乃得免。迨余到重庆主持“东总”为时不久，蒋介石亲下手谕，令C C分子所办的“东北协会”和我们“东北救亡总会”均行取消，以后不准再用这两个团体名义进行活动，伪称将由中央集中东北抗日力量，有控制地组织一东北四省抗敌协会作为统一的群众团体，但并未实行，实际就是为了取消“东总”。余遂以“东总”开始创办之《反攻》半月刊社作为“东总”的旗帜。因有单独的登记证，用郭沫若题写的一块木牌挂在猫儿石，余所住的宅门上假王化一的名为发行人（王是戴笠的设计委员），出印刊物，一直出到一九四五年的“九·一八”，始宣布停刊。但也不是一帆风顺，中间反动派密令市内各印刷厂不予印刷。幸有陆军杂志社经理陈彦之敢冒风险，承担印刷（陈的杂志社在沙坪坝东山里，余每由猫儿石沿嘉陵江边步行至沙坪坝，会金锡如

及陈彦之)。当时担任编此《反攻》刊物的，前后有张兆林、苑士杰、秦笠、胡循、邹勇策、聂长林、孙汉超等同志。常给撰稿的有刘砥方、绿川英子夫妇（均逝去）、金锡如、吴家兴、金长佑等。今其人或生或死，不禁感慨系之。

一九四一年八月，病妻曾昭惠没于凤翔。曾氏身体素弱，经不起苦难环境，于一九三八年八月余赴延安时，在西安患精神分裂症，余以精神疗法，陪伴年余，未药而愈。余被禁重庆，曾氏病犯，服药自杀而死。此时与余同车来重庆之王桂珊，随阎宝航做敌机轰炸后的抚济伤亡工作，不久王转中、法、比、瑞文化协会工作，敌机滥炸重庆市，无法办公，该会秘书李羽军同志（地下共产党员，已逝）因余患重感冒，遣王到猫儿石照顾余病，由此发生感情。王主要要求进步之心甚切，故不嫌余之穷措大也。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五日，余与王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婚礼。余素无资财，多年来赖好友们资助为生，大家戏称余为难民。助余者先后有刘云章、杜斌丞、赵寿山、刘多荃等。因此东北同乡田雨时倡议，凡对余贺禧者，每人出钱五元作为礼仪。特务头子戴笠闻余安家，别有用心地高兴，独赠礼仪二千元，余将计就计受之，恰好即以此款续办《反攻》。王与余结婚后，参加“东总”，为会内同志们洗衣、缝补、劈柴烧饭，颇著勤劳。余则每日爬越山岭，横渡嘉陵江或长江，到市内或南山，作救亡活动。有时阴雨，江水泛滥，淤没山脚达四十米宽，水退后泥泞深处几乎没膝，余傍晚由市内归来，须两手触地，如马上山状，爬行而过，此景始终不忘。有时天太晚，不能回乡下，常住临江门附近黄河水利委员会梁蔼然同志处。由猫儿石乡下到市内，或再到南山（长江南岸东北元老所居），须过江上山，走石板铺的羊肠小路，最高阶层有千余级者。时余年已四十九岁，每天往返路程约六七十里，

从未觉疲倦过，虽是壮年精力足，亦革命意志坚强使然。一日梁蔼然同志到猫儿石，介绍苏联大使馆秘书安得列夫与余会谈，余诺之，由此与该秘书有往来。特务在猫儿石山头，遥为监视，余佯为不知。盖余自西安事变，一直公开主张联苏联共，对人毫不隐讳。有一次戴笠请客，在饭桌上说已成立一东北行动委员会，实即武装特务组织。余乘机说，东北青年之去延安者，并不是都抱着共产主义去的，而是抱着抗日的决心去的。任何省的人不主张联共抗日都可以，惟东北人不能不主张联共抗日。余说话毕，座中人讶余言之太直率，戴把脸沉下说，青年思想简单，容易受欺骗。饭后戴语人曰，高崇民够个汉子，敢作敢说。由斯戴表面对余加以伪善，阴实嫉之。余因东北“元老”（莫德惠、刘尚清、万福麟、刘哲、邹作华等）在南山终日打麻将赌钱，言不及义，在《反攻》半月刊上写一篇短文，题为《所望于东北元老者》。言词激切，“元老”们恼羞成怒，推刘哲、邹作华出头，告到蒋介石面前。他们认为我曾参加过西安事变，这回蒋必能严惩。不料蒋不愿因小失大而为他们利用，只是交戴笠处理。戴托吉林萧振瀛为之撮和。萧拟请客为大家见面，但老奸巨猾的莫德惠，看蒋不想把余怎样，又以余之文章词严义正，遂不同意萧的作法。对萧说，高崇民是硬汉子，刘哲性情粗暴，见面时再吵起来怎么办？我们元老这已经够丢人的了，今后只要崇民不再骂就好了。也表示我等元老，不能与青年人一般见识，萧乃据以回复戴笠，了事。

余既公开主张联苏联共，故有时出入于新华日报社或曾家岩五十号（党的办事处），甚或与苏联大使馆秘书安得列夫见面，都不太避讳。因为反动派在这些地方周围，都布下特务，无法偷渡。偶与戴笠见面，他问到时，亦直言无隐。同时由于叛徒袁小轩的证实，戴亦确信余不是共产党员，对余之主张联